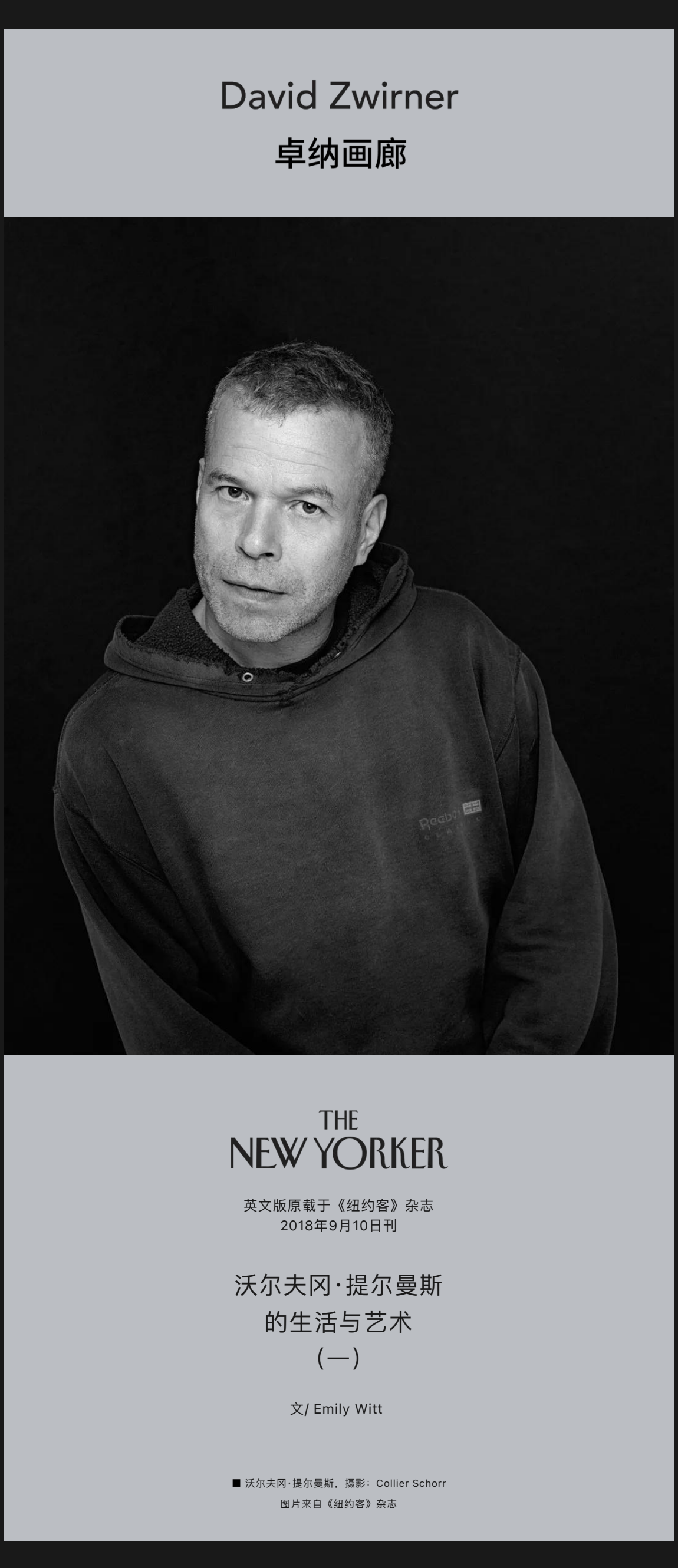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的生活与艺术｜长篇人物特写（一）

Emily Witt 卓纳画廊DavidZwirner 2024-03-08 10:30 中国香港



David Zwirner
卓纳画廊

THE NEW YORKER
英文版原载于《纽约客》杂志
2018年9月10日刊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
的生活与艺术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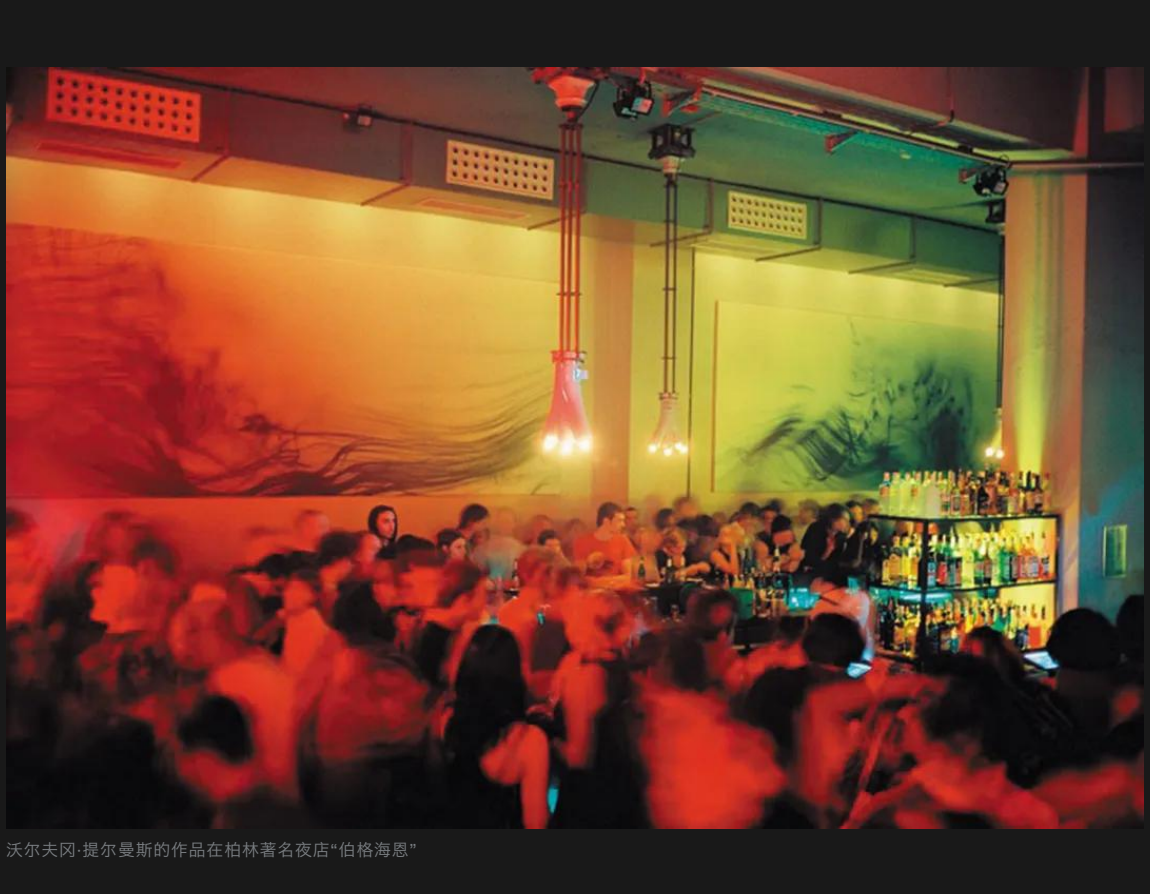
文/ Emily Witt

■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摄影：Collier Schorr
图片来自《纽约客》杂志

过去三十多年来，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1968年生）的摄影探索了人文和社会政治面貌的脆弱性；在转瞬即逝的日常图像中揭露出事物的本质，以及他所致志于此的精神乌托邦。

3月25日，提尔曼斯即将在画廊香港空间举办新展《本质为重》（The Point is Matter）。

一连三天，我们借《纽约客》杂志的长篇人物特写，带你走进他的工作室，全面回溯他的创作起点、摄影哲学和人生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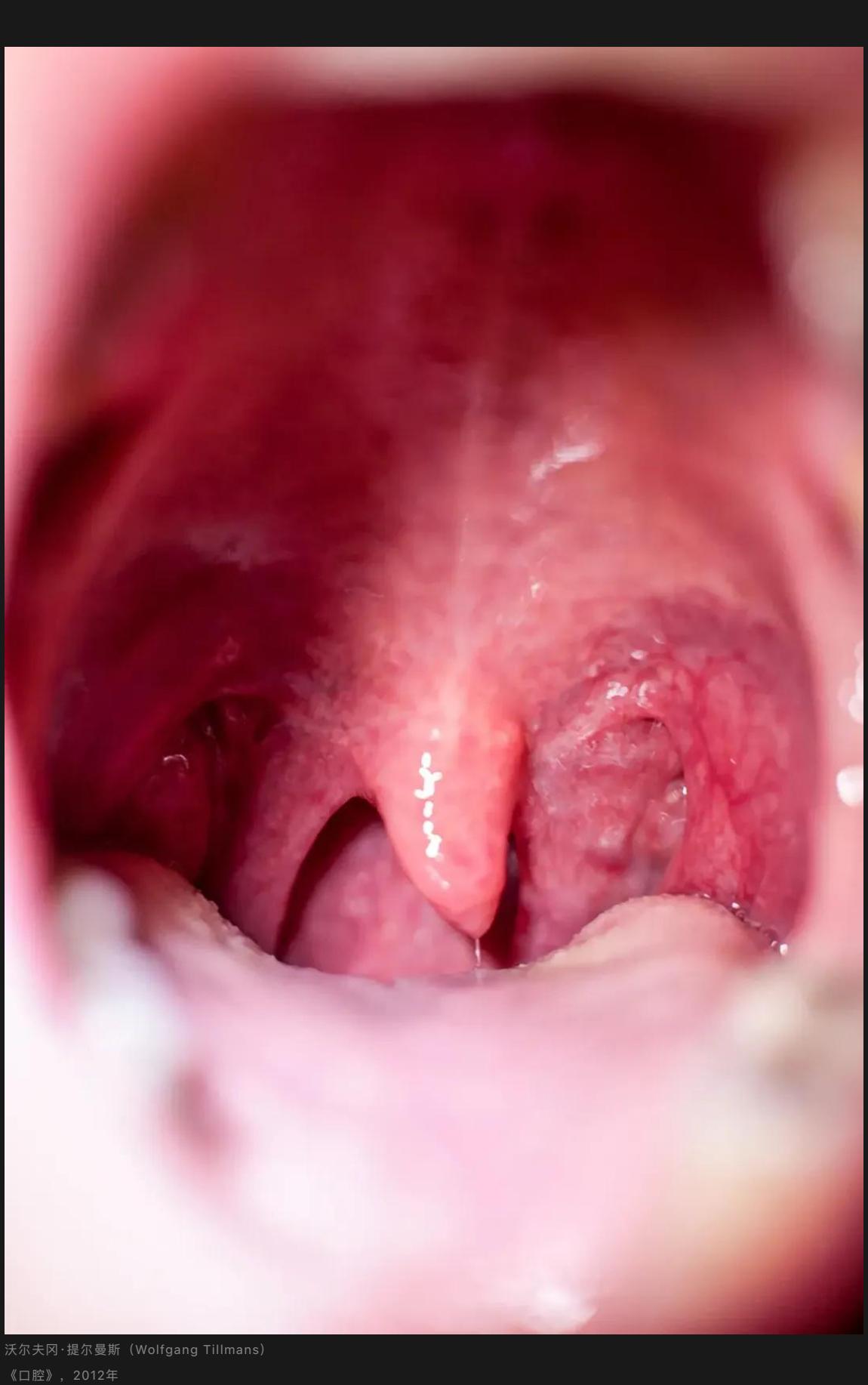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的作品在柏林著名夜店“伯格海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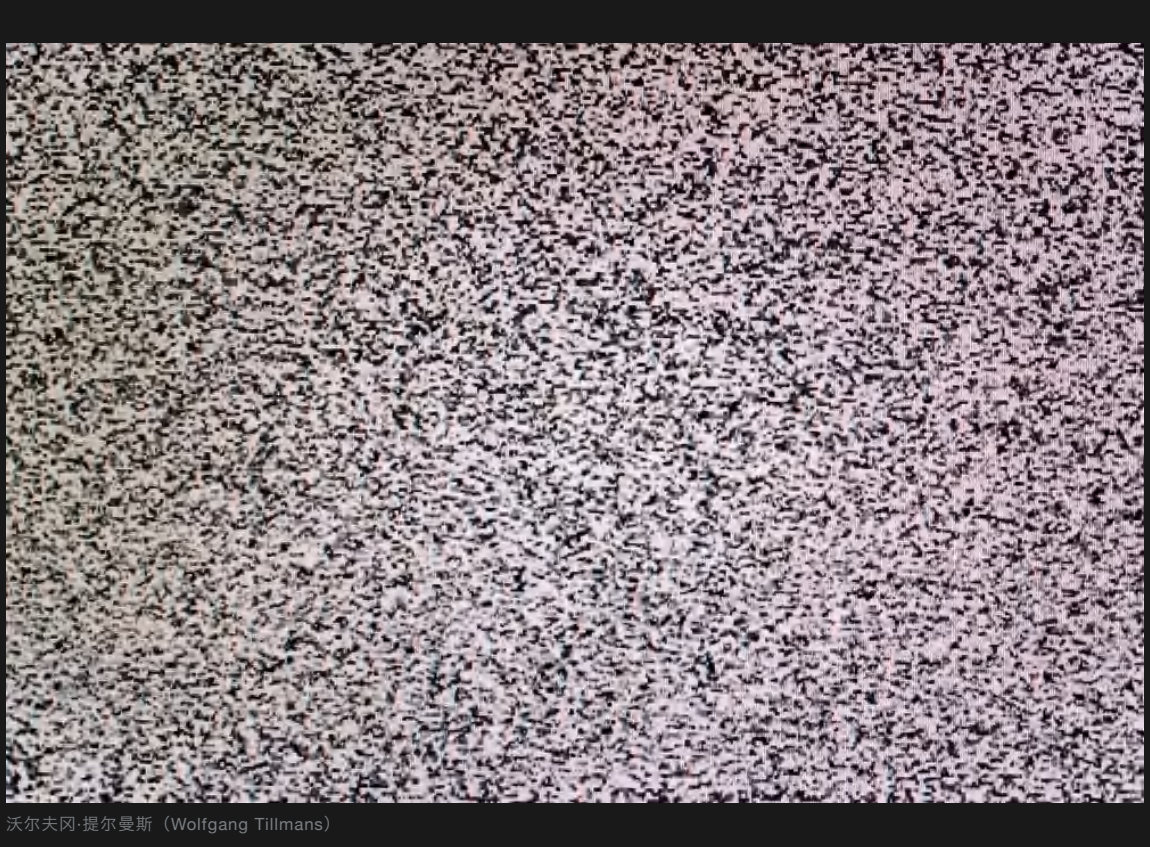
在柏林夜店“伯格海恩”（Berghain）楼上“全景酒吧”（Panorama Bar）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张硕大的、没有额外灯光照明的照片，拍摄的是一截喉咙的背面——它出自德国艺术家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是艺术家挂在这里墙上的三幅照片之一。

“伯格海恩”是一家“铁克诺电子舞曲”（Techno）风格的夜店，以其独特的礼节守则和撼人的音响系统而闻名。这里禁止摄影。顾客在进入时，手机相机的镜头上会被贴上贴纸。门卫对于准入什么样的人非常严格，他们很明显不怎么喜欢那些炫富的人。派对会从星期六晚上11:59开始，一直持续到星期一的早晨。大部分人通常会在里面呆上十二个小时，甚至二十个小时。这里不设VIP区域。洗手间也不分性别，气氛开放，满是酷儿的做派。“蹦迪”的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伯格海恩”朝圣。有些人称这里为“教堂”。

当夜店的老板在2004年初识提尔曼斯想收藏他的照片时，当时的顾客大多是男同性恋者，因此他选择了作品《裸像》（Nackt），照片里是一个袒露着私处的女性。到了2009年，随着“伯格海恩”的声名不断扩大，并且有越来越多异性恋的客户时，他用《菲利普，特写三号》（Philip，Close Up III）代替了之前的作品，照片中是一位暴露的男性。六年后，他换上了那张喉咙的照片，并且形容它“就像种种欢乐一样，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出现”。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口腔》，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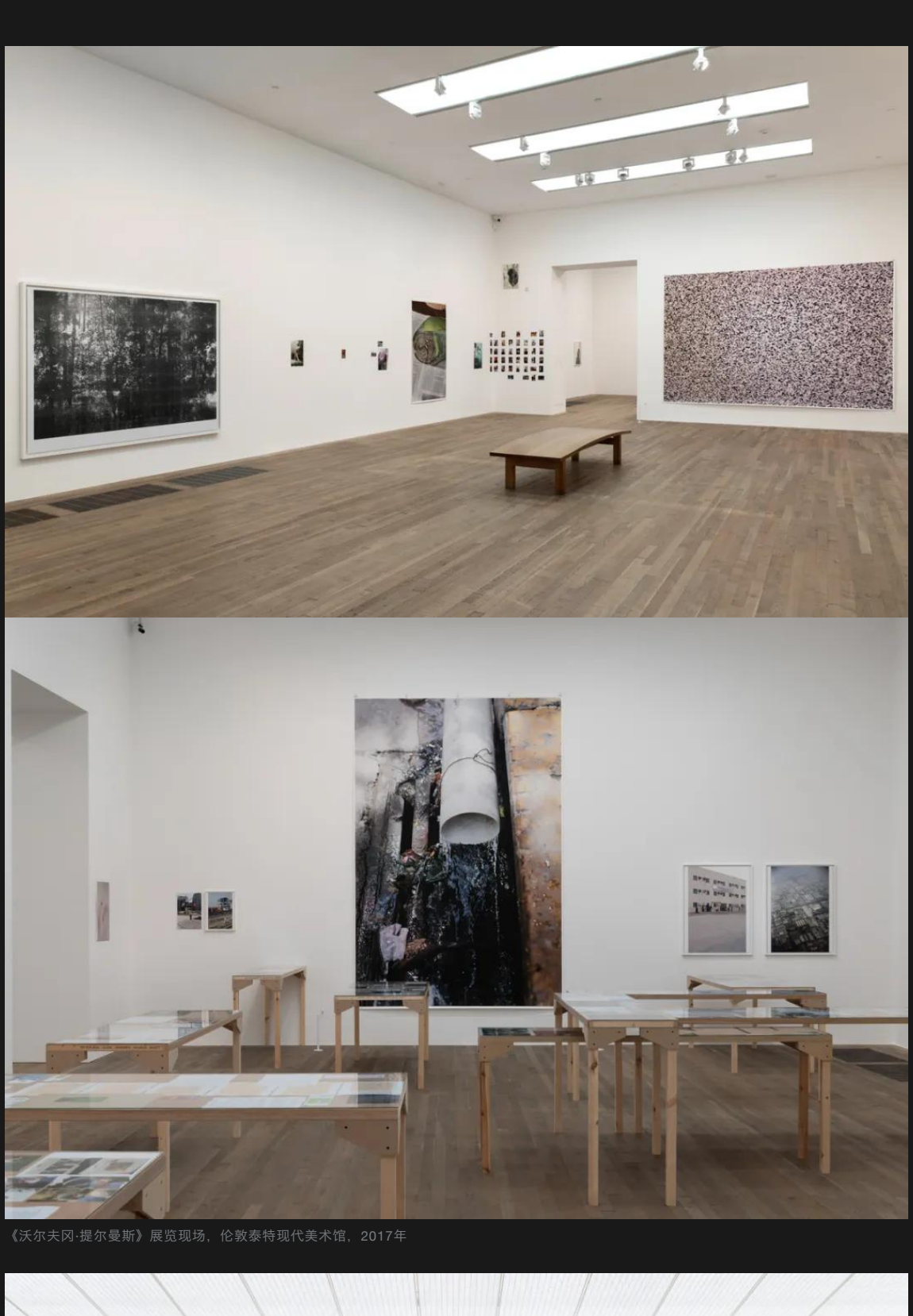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广播结尾一号》，2014年
喷墨打印
273.1 × 410.2 厘米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收藏

提尔曼斯在“伯格海恩”的另外两张照片挂在后墙上，是他《广播结尾》（End of Broadcast）系列的大幅喷墨印刷作品，描绘了静态的电视影像：受干扰的黑白码图像，在仔细的检视下展现出色块像素。

2014年，他在圣彼得堡一家酒店的客房里拍摄了这张照片，当时俄罗斯刚刚入侵了克里米亚。提尔曼斯所思考的是某种制度的象征，还有人们的双眼如何地欺骗着自己的想法，以及正如他在今年早些时候告诉我的那样，“我们如何获取那么多信息而又必须学着让其中的大部分消失。”

同一系列中的另一张照片，也被珍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永久馆藏中，而提尔曼斯很快将于2021年在那里进行一次大型回顾展。（注：回顾展《无畏地看》后延期至2022年举办）去年，他在泰特现代美术馆和贝耶勒基金会（Fondation Beyeler）举办了两场专题个展。不过，对某些人来说，他悬挂在“全景酒吧”并在烟雾缭绕中展出的三张照片，才是一项更有意义的殊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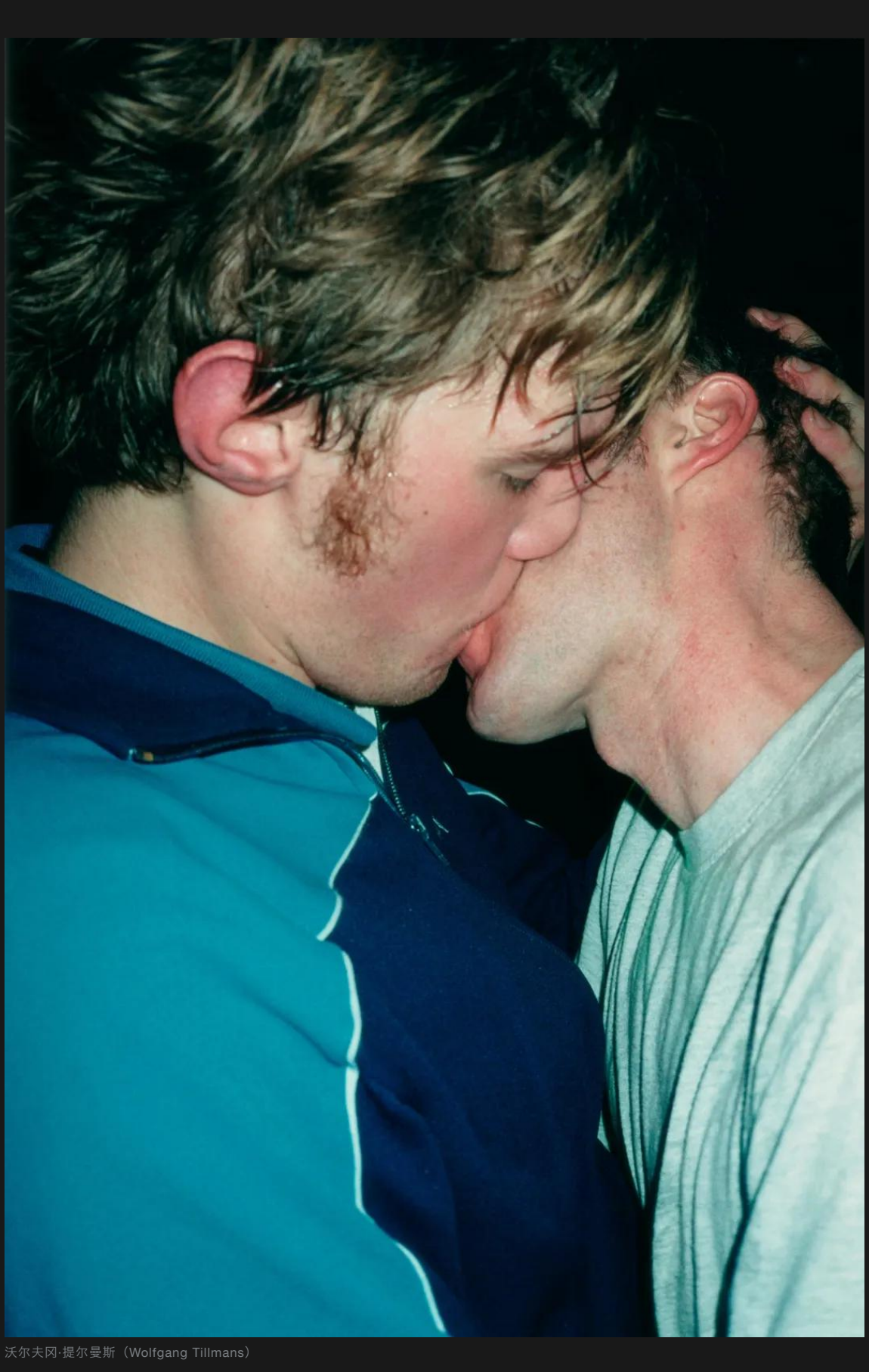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展览现场，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2017年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展览现场，巴塞尔贝耶勒基金会，2017年

早在1990年代初期，提尔曼斯便以散发着开放和坦承之态的年轻人照片而闻名。他记录了X世代和他们的狂欢文化，并为音乐人Aphex Twin和Blur乐队的主唱达蒙·奥尔巴恩（Damon Albarn）拍摄肖像。他曾在伦敦的“Soundshaft”夜店里拍摄过大汗淋漓的身体和扩散的瞳孔；在牙买加拍摄雷鬼音乐人的表演现场；还有年轻学生们派对之后的风卷残云。

但是，提尔曼斯认为——他向来欣赏克里斯蒂安·沙德（Christian Schad）和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描画1920年代柏林夜店场景——汉堡歌剧院或是柏林“爱之游行”中举办的“迷幻浩室音乐”（acid-house-music）之夜不仅仅是享乐主义的聚会，更是一项政治性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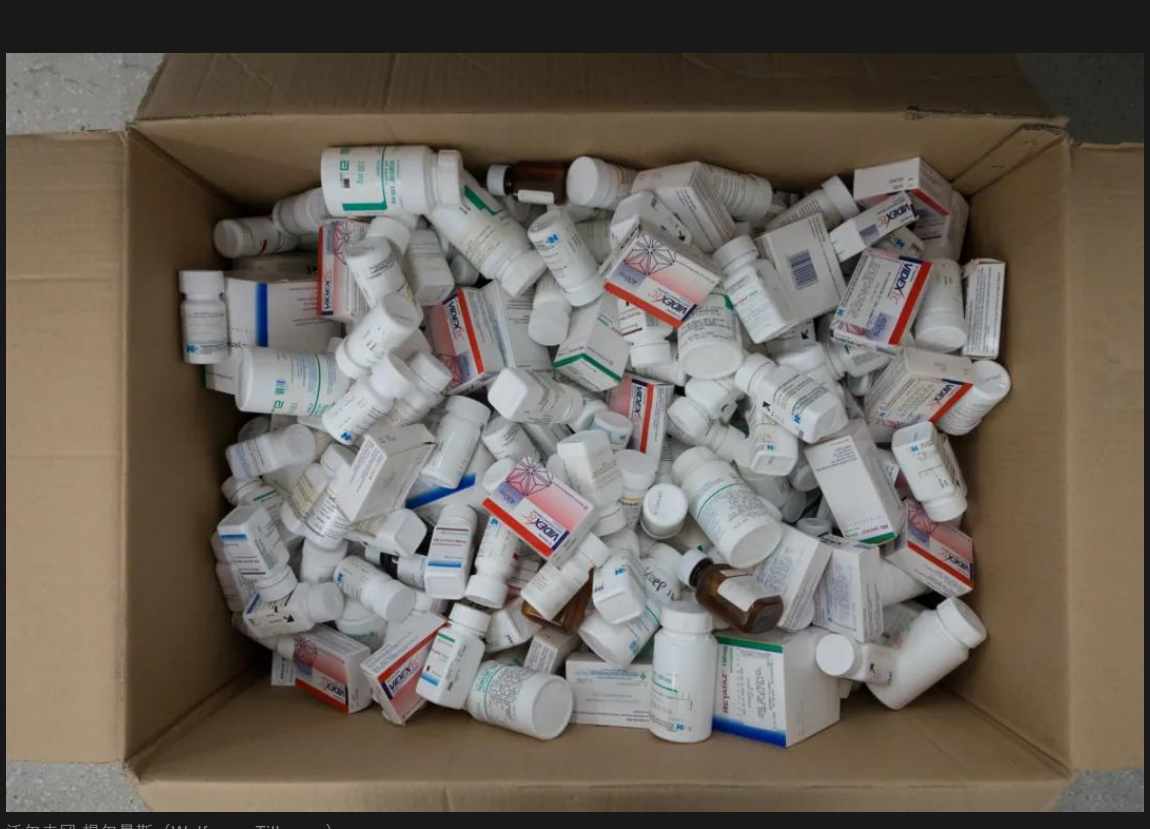
“我一直都很清楚，这种自由只有在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感到害怕之后才有可能获得”，他这样对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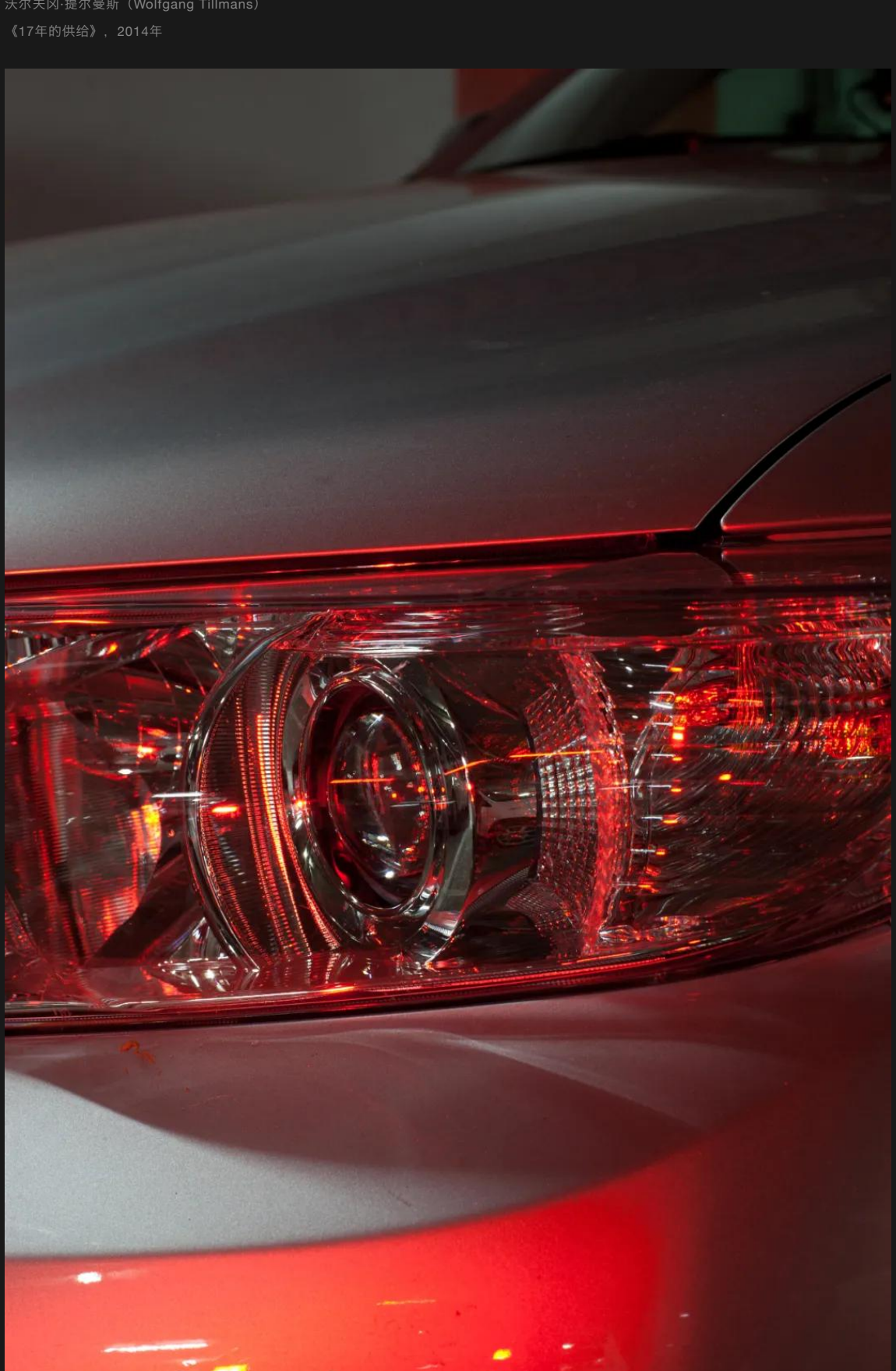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雄鸡酒吧（吻）》，2002年
该作品为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慕尼黑现代艺术陈列馆、渥太华加拿大国立美术馆、明尼阿波利斯沃克艺术中心收藏

提尔曼斯出生于1968年，是战后第一代可以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轻松往返的欧洲人，他们拒绝单一的国籍身份并且拥有合法的同性恋关系。1997年，他被确诊感染了H.I.V.，但当时已经可以及时地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ntiretroviral therapy）。在采访中，他回应了自己所身处时代那种相对乐观的形象，并称其为“一种现实，人们在其中能高兴地一起用摇头丸，或是在公园开派对，同时又可以是孤独、认真的个体：在树上裸身坐着、在幽暗的厕所角落里、一边听着Moby一边躺在阳光里。”（提尔曼斯曾在1993年拍摄过这位电子音乐家。）

提尔曼斯承认，在他所拍照片的世界之外，这种自由只存在于“非常小的、有如口袋般的局部区域”。提尔曼斯艺术创作的另一条脉络，是探索他个人乌托邦所依赖的政治性共识的脆弱性。提尔曼斯拍摄了同性恋游行、反战游行和“黑人生命事关重要”（Black Lives Matter）的抗议集会。在他拍摄夜空的照片中，星星和照相机所产生的光学畸变之间无从区分，他以此提请人们注意双眼所见的不可靠。在2014年，也就是服用抗H.I.V.药物已达十七年之后，他拍摄了一张照片来概叹化学的奇迹让他得以幸存至今。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17年的供给》，2014年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车头灯（a）》，2012年

他的艺术经常展现新鲜事物。他用镜头记录下设计风格及周围环境的细微变化：汽车的前灯从看起来友善的设计变得非常光洁、有如“鲨鱼眼”般独具侵略性的转变；为了阻止露宿者而沿人行道铺设的尖尖的隆起物；一块机场指示牌，引导人们前往“持世界护照者休息区”的路线；还有公共住房项目里用到的覆盖物，它们在去年伦敦格林费尔大厦（Grenfell Tower）的火灾之后变得臭名昭著。

“我一直在想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夹子的材质问题”，我们一起吃着外卖咖喱时他这样对我说，一边玩弄着塑料食物外带盒上齿状的链接部分，还有一个水瓶盖和他拿在手里的纸夹。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浇水，a》，2022年

去年十一月，在“全景酒吧”看到提尔曼斯照片之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去了他位于柏林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附近的工作室拜访。工作室的空间占据了原本用作百货商店大楼的一整个楼层，这个楼由包豪斯建筑师麦克斯·陶特（Max Taut）设计。里面有着没有经过抛光处理的水泥地板和长长的连排窗户。提尔曼斯种了一小块室内植物——包括很有雕塑感的仙人掌、纸莎草、绿紫色叶子的秋海棠、精致的蕨类植物——这些都是他从朋友的植物上剪下的枝蔓长成的，或是在旅途中收集来的。工作室的墙上装饰着地图、展览海报和抗议活动的标语，架子上摆满了唱片和书籍。

提尔曼斯也有很多“静物”，半包高卢金丝烟（Gauloises）、好几沓便利贴纸、还有散放在电脑显示器和植物之间的几个胶带座，便提醒了我这一点。他鼓励大家从视觉的混乱中做出选择，如其所说：“这对助手和我来说都很有趣。”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静物塔波特路》，1991年

那天是星期一，提尔曼斯身穿蓝色的彪马运动裤、阿迪达斯跑步鞋和海军蓝色的带帽运动衫，站在会议桌旁喝着咖啡，几位年轻的员工围在他身边。提尔曼斯身上是他二十五年来一直穿着的T恤、牛仔裤和运动鞋的装扮。和大多数情形一样，他是在场的人里面最高的那个，有着挺直而宽阔的肩膀，但始终举止优雅，还有那双不太眨眼的棕色眼睛，似乎能洞察一切。

除了摄影之外，他还制作电子音乐，他刚从意大利都灵回来，与英国音乐制作人奥斯卡·珀维尔（Oscar Powell）一起为都灵当地一个名为“Club to Club”的音乐节作现场表演。提尔曼斯对老牌的底特律DJ里奇·哈顿（Richie Hawtin）和年轻的德国DJ海伦娜·霍夫（Helena Hauff）进行了对比，前者演出时喜欢被各种设备所包围并且总是以华丽的视觉效果作为舞台背景，后者则惯于采取非常极简的手法：两个打碟机、由香烟的烟雾及气味所围绕、外加一瓶威士忌。事实上，提尔曼斯曾在1994年为哈顿拍摄过肖像。

“我很爱海伦娜·霍夫”，有人在一旁说道：“我觉得她好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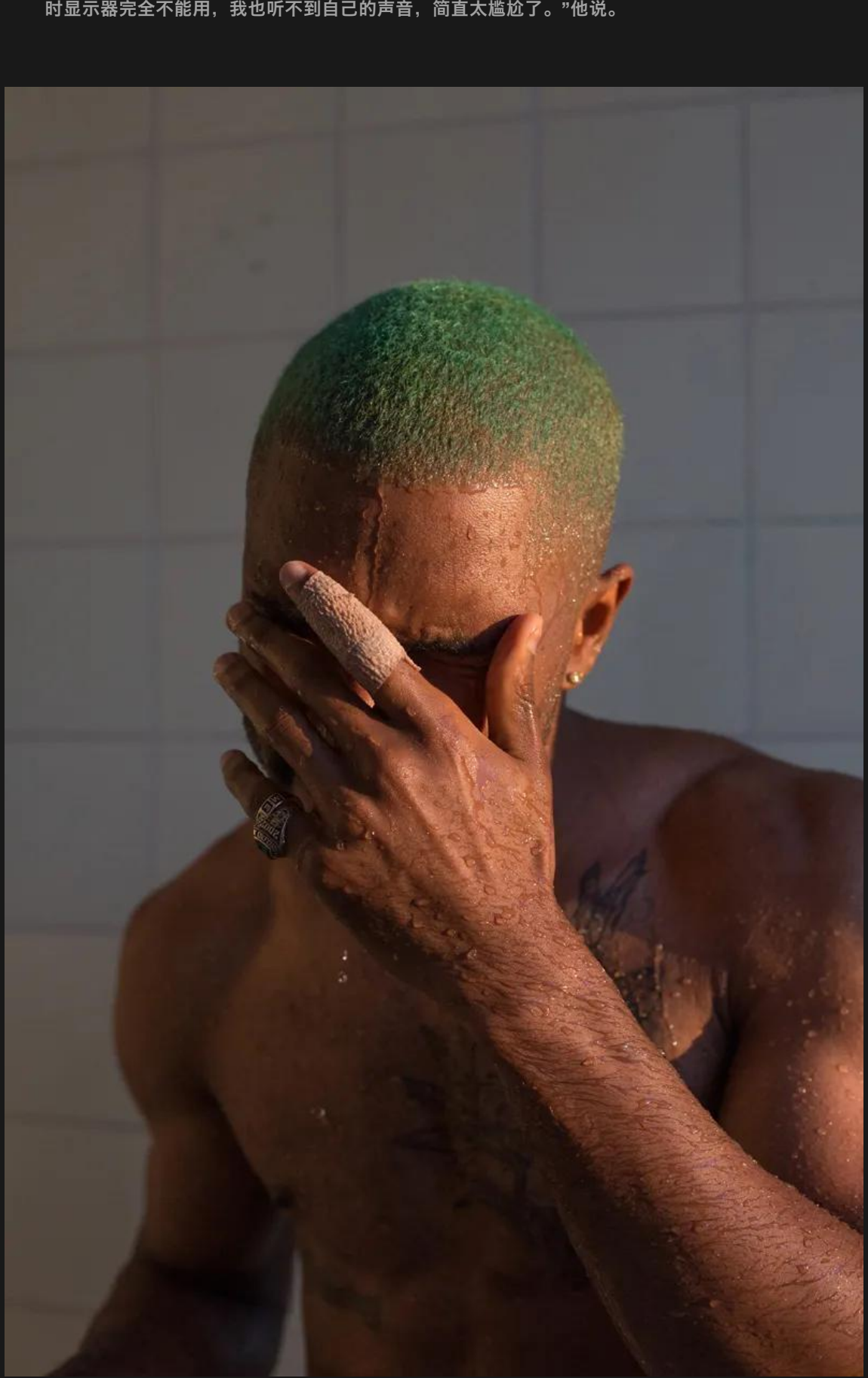
“啊，是吗？”提尔曼斯带着德语口音说道。他喜欢在对话的时候充分尊重每个人。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o.M.》，199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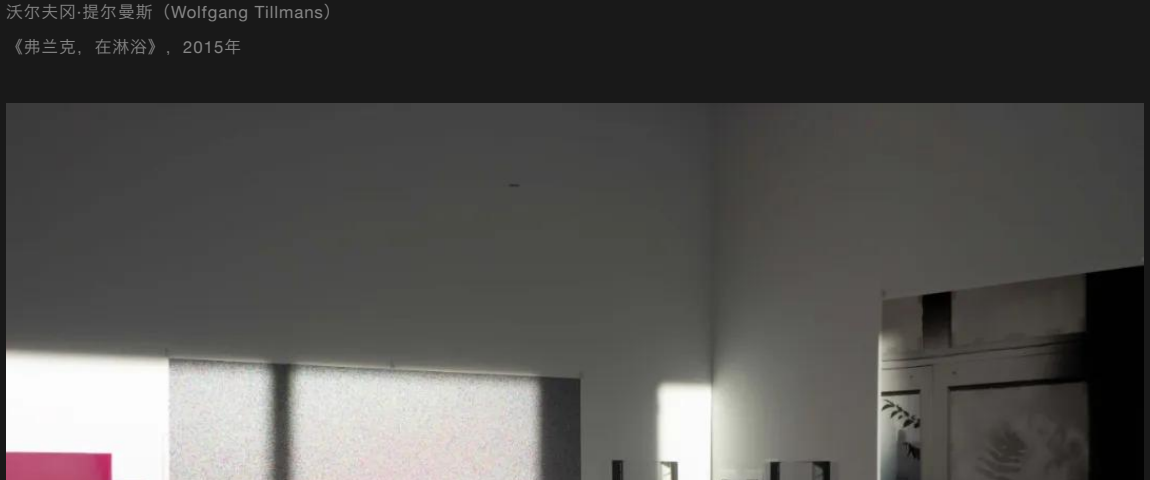
提尔曼斯很友善而且彬彬有礼。他要求一起工作的人要守时、高效、随时做好准备，但这些要求并不出于他的严苛，只是因为他一直以略高于大多数人的标准生活着。当他提问时，人们就会意识到假装有才识和真正的知识渊博之间是有区别的。他可以解释为什么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时斑马的黑白条纹会变成有色彩的勾勒，还有为什么十八世纪的天文学家会误解金星的穿行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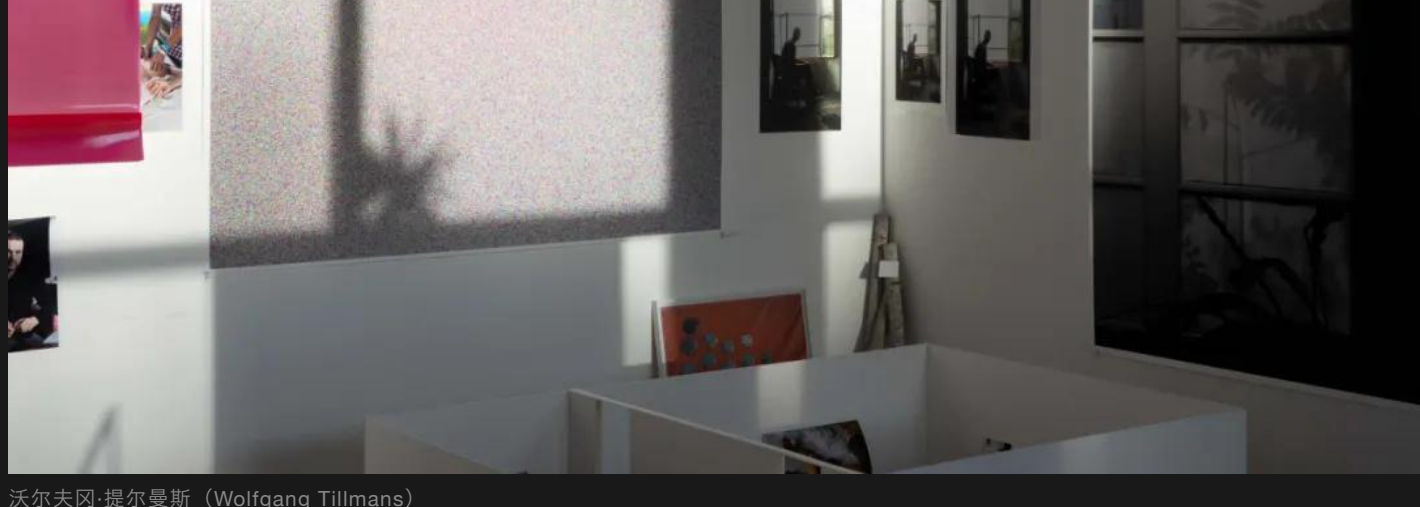
他避免使用工具默认的自动化设置，也不喜欢对话中的不精确。在我们见面后不久，他向我描述自己如何为一些照片的边缘进行描画，以使相纸上的颜色看起来均匀而饱和。他还举起一张照片。“我明白了”，我说。“我觉得你并不明白。”他回复道。

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提尔曼斯在德国西部创作了第一张专辑，并于2016年发布了第二张。他的歌曲《设备控制》（Device Control）出现在弗兰克·奥申（Frank Ocean）的专辑《无尽》（Endless）中。【提尔曼斯还为专辑《金色》（Blond）的封面拍摄了奥申的照片。】提尔曼斯将自己音乐生涯上长时间的中断归咎于近三十年前在毕业典礼上那场灾难性的翻唱表演。“当时显示器完全不能用，我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简直太尴尬了。”他说。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弗兰克，在淋浴》，20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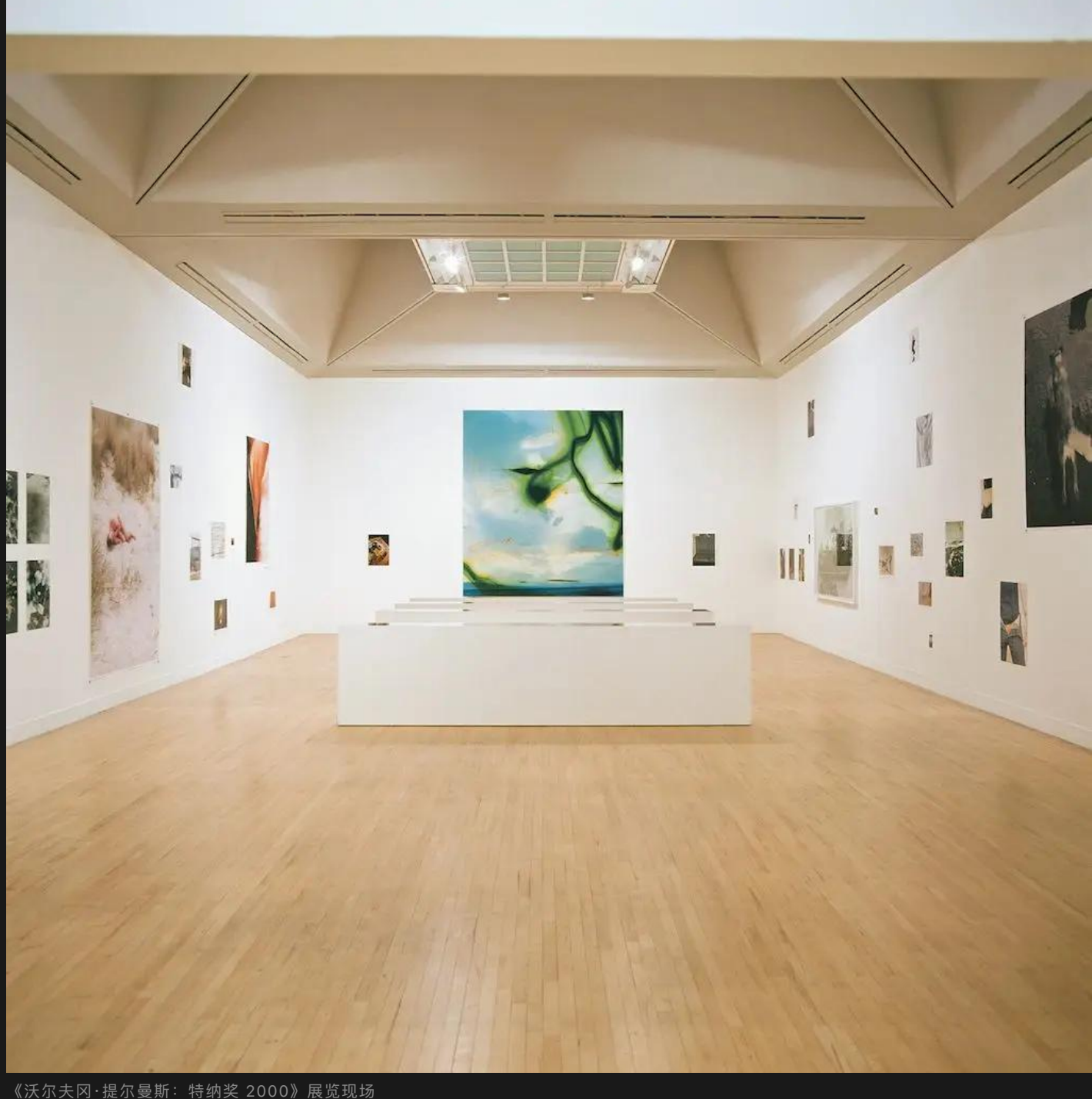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日照线》，2023年

近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深思熟虑着有关尴尬本身，他认为这种情绪既是保护性的又是抑制性的，而且他在最近的一次决定中克服了这种尴尬：他决定公开反对英国脱欧。提尔曼斯在职业生涯的前二十年里主要在伦敦生活工作，他1992年从英格兰伯恩茅斯（Bournemouth）的艺术学校毕业，并且视伦敦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连续统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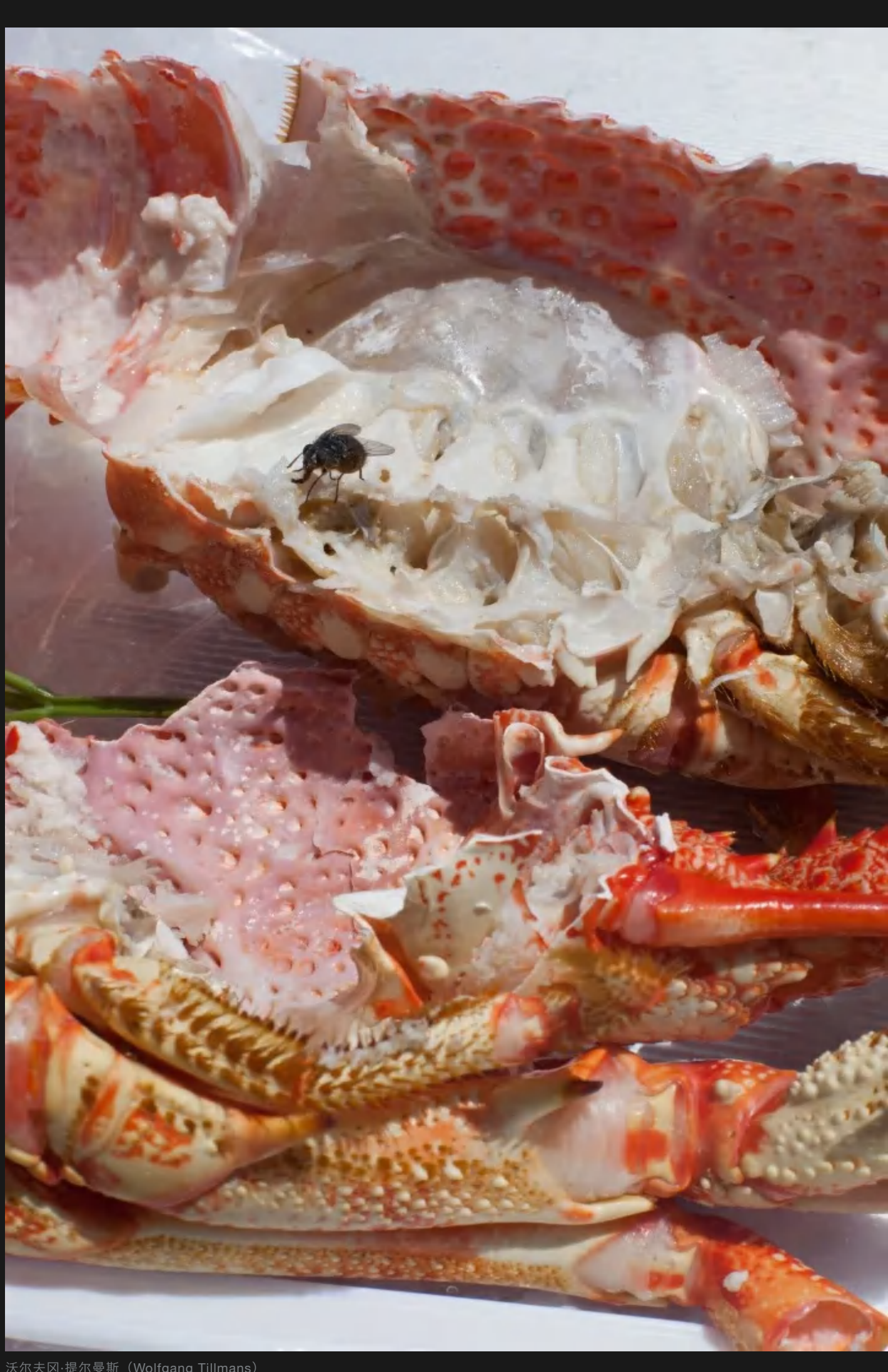
2000年，他是第一位获得了英国特纳艺术大奖（Turner Prize）的非英国籍艺术家，也是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摄影艺术家。在英国脱欧的公投之前，他制作了两万张海报，一系列的T恤，还发了许多帖子到社交媒体上。像他的照片一样，这些图片的色调看起来不动声色，地平线或是白色悬崖的图像与文字互相覆盖，上面写着：“六十年来，欧盟一直是欧洲各国之间在历经数百年流血冲突之后的和平基础，6月23日前仍可投票”；“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也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DJ和音乐人们：在你前往伊维萨岛（Ibiza）和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之前，请确保使用邮政或代理方式进行投票”。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特纳奖 2000》展览现场
伦敦泰特美术馆英国馆，2000年

去年，当右翼党派“德国另类党”威胁要在德国议会选举中获利时，提尔曼斯用类似风格的海报发起了另一场抗议运动，这些海报都以德语写就：“我们不爱民族主义”、“星期天很棒：请去参加聚会并且投票”、“如果你不投票，那你就是在支持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投票就能产生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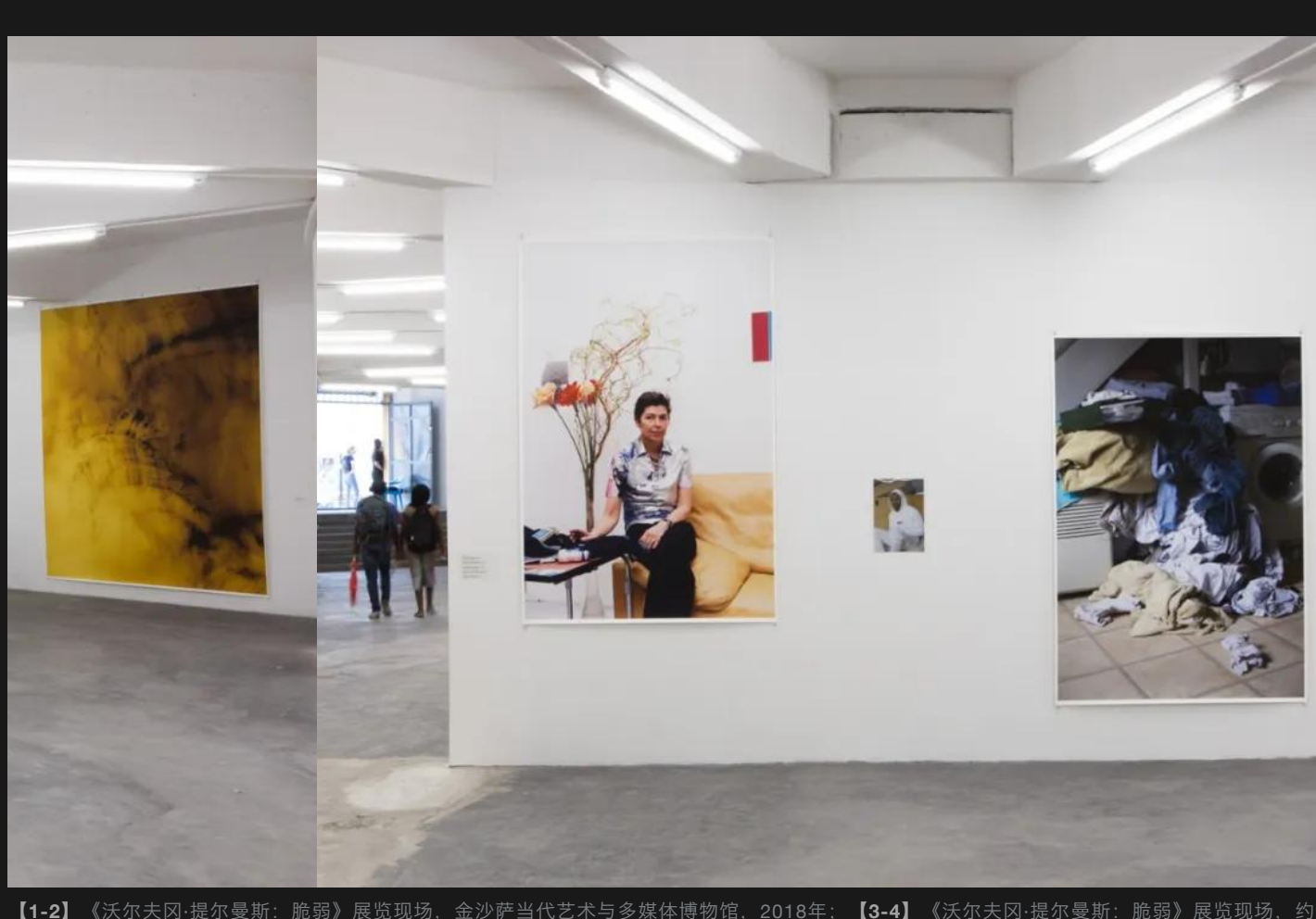
自英国脱欧开展运动以来的两年间，提尔曼斯完全成为了一位艺术政治家，他在德国报纸《时代周刊》（Die Zeit）上接受采访，并在伦敦当代艺术学院就民族主义的威胁发表演讲……在今年早些时候，他与朋友、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一起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征求“重塑欧洲”的提案。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astro crusto, a》，2012年

月历上写着厨房的琐碎事项，头戴棒球帽、穿着复古毛衣的助手则在检查一张喷墨打印图片上可能存在的瑕疵，并且准备好了从刚果金沙萨（Kinshasa）起飞航班的更新信息——提尔曼斯很快要在一月前往当地，开始为他在非洲为期三年的巡回展筹备首展。

提尔曼斯是一位细心的档案保管员，他将一些文档存放在一个后室，紧挨着他已经养了十九年的一棵榕树旁。有关他过往的任何点滴都不会被视作琐碎。在我的到访期间，我看到他为是否要丢弃一些曾经存放照片但已经磨损甚至破裂的盒子而苦恼。在盒子上，记号笔标注了展览场馆的名字来对文件归档——“诺丁汉，泰特”——此外还戳盖了已经停止使用的伦敦工作室地址。提尔曼斯显得犹豫。他的助手们在一旁笑了。



【1-2】《沃尔夫冈·提尔曼斯：脆弱》展览现场，金沙萨当代艺术与多媒体博物馆，2018年；**【3-4】**《沃尔夫冈·提尔曼斯：脆弱》展览现场，约翰内斯堡美术馆，2018年；**【5-6】**《沃尔夫冈·提尔曼斯：脆弱》展览现场，加纳阿克拉技术与科学博物馆，2021年。

提尔曼斯的工作室本身就是一台非官僚主义的创意机器，它结合了日耳曼的高效与严格标准，室内贴着印有海豹幼崽的营地招贴，还有充足的“Club-Mate”牌苏打水的库存。反对英国脱欧的各类印刷品被钉在墙上，其中一张在一个心形图案里写着“欧盟的官僚们”，这些印刷品上面还钉着一张手握吉他的克洛·塞维尼（Chloë Sevigny）的肖像。

“确实，如果能有一处盒子的归档，对你会很重要”，其中一个人说道，略带玩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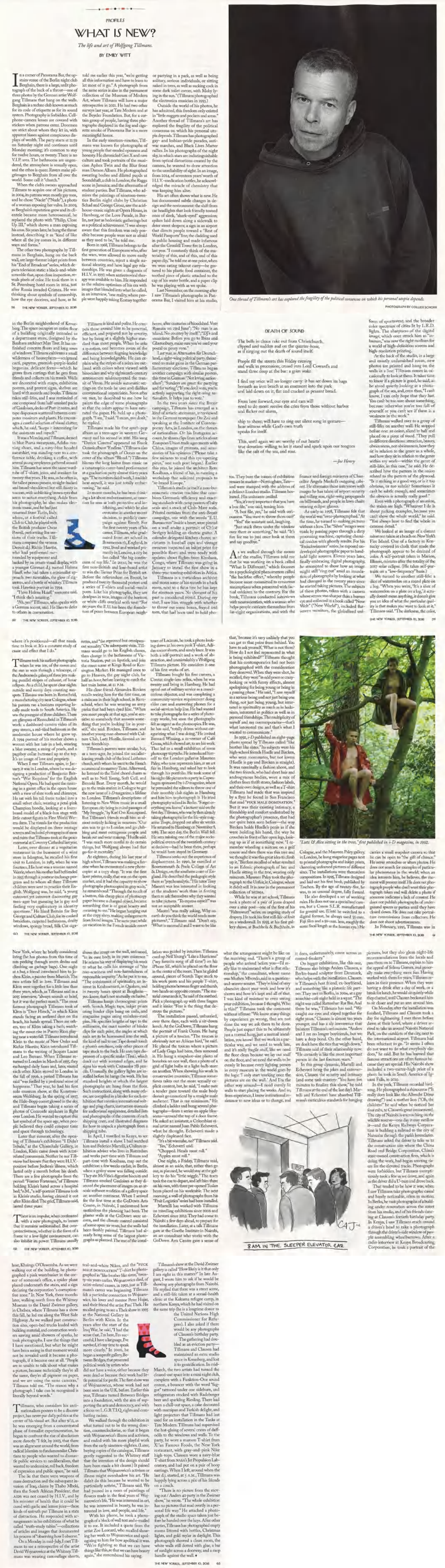
“一处盒子的归档，是的”，他颇为严肃地说。“你想扔掉吗？”

“是啊！”助手笑着说。

“还是把它们堆在窗户下面吧”，他说。“之后看到它们再道别，对我来说会很有趣。”

未完待续

英文版原文原载于《纽约客》杂志
2018年9月10日刊



PROFILES

WHAT IS NEW?

The life and art of Wolfgang Tillmans.

BY EMILY WITT

In a corner of Panorama Bar, the upstairs venue of the Berlin night club Berghain, there is a large, unlit photograph of the back of a throat—one of three photos by the German artist Wolfgang Tillmans that hang on the walls. Berghain is a techno club known as much for its code of etiquette as for its sound system. Photography is forbidden. Cell-phone-camera lenses are covered with stickers when patrons enter. Doormen are strict about whom they let in, with apparent biases against conspicuous displays of wealth. The party starts at 11:59 on Saturday night and continues until Monday morning; it's common to stay for twelve hours, or twenty. There is no V.I.P. area. The bathrooms are ungendered, the atmosphere is sexually open, and the ethos is queer. Ravers make pilgrimages to Berghai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ome call it "church."

When the club's owners approached Tillmans to acquire one of his pictures, in 2004, its patrons were mostly gay men, and he chose "Nackt" ("Nude"), a photo of a woman exposing her vulva. In 2009, as Berghain's reputation grew and its clientele became more heterosexual, he replaced the photo with "Philip, Close Up III," which shows a man exposing his anus. Six years later, he hung the throat instead, describing it as "kind of like where all the joy comes in, in different ways and forms."

The other two photographs by Tillmans in Berghain, hung on the back wall, are large-format inkjet prints from his "End of Broadcast" series, which depicts television static: a black-and-white scramble that, upon close inspection, reveals pixels of color. He took them in a St. Petersburg hotel room in 2014, just after Russia invaded Crimea. He was thinking about symbols of censorship, how the eye deceives, and how, as he told me earlier this year, "we're getting all this information and have to learn to let most of it go." A photograph from the same series is also in the permanent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where Tillmans will have a major retrospective in 2021. He had two other surveys last year, at Tate Modern and at the Beyeler Foundation. But, for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having three photographs displayed in the fog and cigarette smoke of Panorama Bar is a more meaningful honor.

In the early nineteen-nineties, Tillmans was known for photographs of young people that exuded openness and honesty. He chronicled Gen X and rave culture and took portraits of the musician Aphex Twin and the Blur front man Damon Albarn. He photographed sweating bodies and dilated pupils at Soundshaft, a club in London; the Ragga scene in Jamaica; and the aftermaths of student parties. But Tillmans, who admires the paintings of nineteen-twenties Berlin night clubs by Christian Schad and George Grosz, saw the acid-house-music nights at Opera House, in Hamburg, or the Love Parade, in Berlin, not just as hedonistic gatherings but as a political achievement. "I was always aware that this freedom was only possible because people were not as afraid as they used to be," he told me.

Born in 1968, Tillmans belongs to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Europeans who, after the wars, were allowed to move easily between countries, reject a single national identity, and have legal gay relationships. He was given a diagnosis of H.I.V. in 1997, when antiretroviral therapy was available to him. He responded to the relative optimism of his era with images that blended into what he called, in an interview, "one reality, where people were happily taking Ecstasy together or partying in a park, as well as being solitary, serious individuals, or sitting naked in trees, as well as sucking cock in some dark toilet corner, with Moby lying in the sun." (Tillmans photographed the electronica musician in 1993.)

Outside the world of his photos, he has admitted, this freedom only existed in "little nuggets and pockets and areas." Another thread of Tillmans's art has explored the fragility of the political consensus on which his personal utopia depends. Tillmans has photographed gay- and lesbian-pride parades, anti-war marches, and Black Lives Matter rallies. In his photographs of the night sky, in which stars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optical distortions created by the camera, he wanted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unreliability of sight. In an image, from 2014, of seventeen years' worth of H.I.V.-medication bottles, he acknowledged the miracle of chemistry that was keeping him alive.

His art often shows what is new. He has documented subtle changes in design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shift from car headlights that look friendly toward ones of sleek, "shark-eyed" aggression; spikes laid down along a sidewalk to deter street sleepers; a sign in an airport that directs people toward a "Rest of World Passports" line; the cladding used in public housing and made infamous after the Grenfell Tower fire in London, last year. "I constantly think of the materiality of this, and of this, and of this paper clip," he told me at one point, when we were eating takeout curry—he gestured to his plastic food container, the toothed piece of plastic attached to the cap of his water bottle, and a paper clip he was playing with as we spoke.

Last November, on the morning after I saw Tillmans's photographs in Panorama Bar, I visited him at his studio, in the Berlin neighborhood of Kreuzberg. The space occupies an entire floor of a building originally intended as a department store, designed by the Bauhaus architect Max Taut. It has unfinished concrete floors and long rows of windows. Tillmans cultivates a small wilderness of houseplants—sculptural cacti, papyrus, greenish-purple-leafed begonias, delicate ferns—which he grows from cuttings that he gets from friends and collects on his travels. Walls are decorated with maps, exhibition posters, and protest signs, shelves are lined with records and books. Tillmans takes still-lifes, and I was reminded of one composed from half-smoked packs of Gauloises, decks of Post-it notes, and tape dispensers scattered between computer monitors and plants. He encourages a careful selection of visual clutter, which, he said, "keeps it interesting for the assistants and myself."

One thread of Tillmans's art has explored the fragility of the political consensus on which his personal utopia depends.

PHOTOGRAPH BY COLLIER SCHORR

It was a Monday, and Tillmans, dressed in blue Puma sweatpants, Adidas running shoes, and a navy-blue hooded sweatshirt, was standing next to a conference table, drinking a coffee, with several young employees gathered around him. Tillmans has worn the same wardrobe of T-shirts, jeans, and sneakers for twenty-five years. He was, as he often is, the tallest person present, straight-backed and broad-shouldered but still dainty in manner, with unblinking brown eyes that seem to notice everything. Aside from his photography, he also makes electronic music, and he had just returned from Turin, Italy, where, at a festival called Club to Club, he played with the British producer Oscar Powell, performing live versions of their tracks. Tillmans compared the veteran Detroit d.j. Richie Hawtin, who had performed surrounded by equipment and backed by an ornate visual display, with a younger German d.j. named Helena Hauff, who had taken a minimalist approach: two turntables, the glow of cigarettes, and a bottle of whiskey. Tillmans took Hawtin's portrait in 1994.

"I love Helena Hauff," someone said. "I think she's amazing."

"Ah, yes?" Tillmans, who speaks with a German accent, said. He likes to defer to others in conversation. Tillmans is kind and polite. He compels those around him to be punctual, efficient, and prepared not by severity, but by living at a slightly higher standard than most people. When he asks a question, one becomes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eigning knowledge and being knowledgeable. He can explain why the stripes of a zebra are outlined with colors when viewed with binoculars and why eighteenth-century astronomers misinterpreted the transit of Venus. He avoids automatic settings on the tools he uses and dislikes conversational imprecision. Soon after we met, he described to me how he paints the edge of some photographs so that the colors appear to have saturated the paper. He held up a photograph. "I see," I said. "I mean, you don't," he replied.

Tillmans made his first synth-pop album as a teen-ager in western Germany and his second in 2016. His song "Device Control" appeared on Frank Ocean's album "Endless." (Tillmans also took the photograph of Ocean on the cover of the album "Blond.") Tillmans blames the long hiatus from music on a catastrophic cover-band performance at a graduation party almost thirty years ago. "The monitors didn't work, I couldn't hear myself, it was just totally embarrassing," he said.

In recent months, he has been thinking a lot about embarrassment, an emotion he sees as both protective and inhibiting, and which he also overcame in another recent decision, to publicly campaign against Brexit. For the first twenty years of his career, Tillmans, who graduated from art school in Bournemouth, England, in 1992, lived and worked primarily in London, a city he has called "the big continuum of my life." In 2000, he was the first non-British and lens-based artist to win the Turner Prize for British art. Before the referendum on Brexit, he produced twenty thousand posters and a series of T-shirts and social-media posts. Like his photographs, they are deadpan in tone, images of the horizon or white cliffs overlaid with text: "For 60 years the E.U.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peace between European neighbours, after centuries of bloodshed. Vote Remain on 23rd June"; "No man is an island. No country by itself"; "DJ's and musicians: Before you go to Ibiza and Glastonbury, make sure you've used your postal or proxy vote."

Last year, as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 right-wing political party, threatened to make gains in the Germ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Tillmans began another campaign with similar posters, this time in German: "Not loving nationalism"; "Sundays are great: for partying and for voting"; "If you don't vote, you're actively supporting the right-wing nationalists. It helps just to vote."

In the two years since the Brexit campaign, Tillmans has emerged as a kind of artistic statesman, interviewed in the German newspaper *Die Zeit* and speaking at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 in London, on the threats of nationalism. On his Instagram account, he shares clips from articles about European Union trade agreements with China, images of protests, and summaries of his opinions ("Please take a few minutes to read this eye-opening piece," one such post began). Earlier this year, he joined the architect Rem Koolhaas, a friend of his, in running a workshop that solicited proposals to "re-brand Europe."

Tillmans's studio is itself a non-bureaucratic creative machine that combines Germanic efficiency and exacting standards with camp posters of baby seals and a stock of Club-Mate soda. Printed outtakes from the anti-Brexit campaign, one with the words "E.U. Bureaucrats" inside a heart, were pinned on a wall under a portrait of Chloë Sevigny holding an electric guitar. A calendar delegated kitchen chores; assistants in baseball caps and vintage sweaters inspected an inkjet print for possible flaws and were ready with updates about flights from Kinshasa, Congo, where Tillmans was going in January to install the first show in a three-year touring exhibition in Africa.

Tillmans is a meticulous archivist and stores some of his records in a back room, next to a ficus tree he has kept for nineteen years. No element of his past is considered trivial. During my visit, I saw him struggle with whether to throw out some boxes, frayed and torn, that had been used to hold photos. They bore the names of exhibition venues in marker—Nottingham, Tate—and were stamped with the address of a defunct London studio. Tillmans hesitated. His assistants smiled.

"Yes,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have a box file," one said, teasing him.

"A box file, yes," he said with seriousness. "You want to throw them out?"

"Yes!" the assistant said, laughing.

"Just stack them under the window over there or something," he said. "It's fun for me to just once look at them and say goodbye."

As we walked through the rooms of the studio, Tillmans told me that he was working on a book called "What Is Different?," which focusses on a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called "the backfire effect," whereby people become more committed to erroneous assumptions when presented with factual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For the book, Tillmans conducted interviews with neuroscientists, with a woman who helps people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far-right organizations, and with the finance and foreign ministers of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s outgoing cabinet. He alternates these interviews with images he has taken of airport security and roiling seas, right-wing propaganda on billboards, and people in lawn chairs wearing eclipse glasses.

As early as 1998, Tillmans felt that the world was "over-photographed." At the time, he turned to making pictures without a lens. The "Silver" images were made by passing paper through a dirty processing machine, capturing chemical residue with ghostly results. For his "Freischwimmer" series, he exposed undeveloped photographic paper to hand-held light sources. Eleven years later, finally embracing digital photography, he attempted to show how an image might still "ring out" amid an inundation of photographs by looking at what had changed in the twenty years since he started taking pictures. The subjects of these photos, taken with a camera whose sensor was sharper than a human eye and collected in a book called "Neue Welt" ("New World"), included flat-screen monitors, the globalized uniform of sportswear, and the broader color spectrum of cities lit by L.E.D. lights. The sharpness of the digital image, which once struck him as "inhuman," was now the right medium for a world of high-definition screens and high-resolution printing.

At the back of the studio, in a large and mostly unfurnished room, new photos are printed and hung on the walls in a line. Tillmans comes in occasionally to look at them. It takes time to know if a picture is good, he said, as he stood quietly looking at a photograph of the sea, and, even then, "I can't know, I can only hope that they last. You can't be too sure about something, because otherwise you're too full of yourself or you can't see if there is a weakness in the work."

Tillmans walked over to a group of still-lifes on another wall. He stopped before one: an onion, sliced in half and placed on a piece of wood. "They pull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attraction, beauty, obviousness, not obviousness, how they sit in relation to the genre as a whole, and how they sit in relation to the genre within my work—within the genre of still-lifes, in this case," he said. He described how the pattern in the onion related to the pattern of the plywood. "Is it striking in a good way, or is it too obvious, or too subtle? Sometimes it can't be subtle enough, and sometimes the obvious is actually really good."

Even with a photograph of an onion, the stakes are high. "Whatever I do is about picking examples, because you can't show the whole world," he said. "You always have to find the whole in extreme detail."

We looked at an image of a distant rainstorm taken at a beach on New York's Fire Island. One of a factory in Kentucky covered in chalk that made the photograph appear to be drained of color. A self-portrait taken in Marion, Illinois, minutes after the totality of the 2017 solar eclipse. (He takes self-portraits on a "low-frequency" basis.)

We turned to another still-life: a slice of watermelon on a round plate on a log. "When you write, 'It's a slice of watermelon on a plate on a log,' it actually doesn't mean anything, it doesn't give you an idea of what the particular quality is that makes you want to look at it," Tillmans said. "The darkness, the color, where it's positioned—all that needs time to look at. It's a constant study of cause and effect that I do."

DEATH OF SOUND

The bells in chaos rake out from Christchurch,
clipped and sudden and on the quarter-hour,
as if ringing out the death of sound itself.

People fill the streets this Friday evening
and walk in procession; crowd into Lord Coward's and
stand three deep at the bar: a grim wake.

I find my voice will no longer carry: it has set down its bags
beneath an iron bench at an easement into the park
and laid down on it, flat and cracked as peasant bread.

From here forward, our eyes and ears will
need to do more: receive the cries from those without harbor
and flicker out alarm,

ship to shore; will have to sing out silent song in gesture—
bear witness while God's own truth
speaks for itself.

This, until again we are worthy of our hearts'
true devotion: willing to let it stand and spark upon our tongues
like the salt of the sea, and roar.

—*Joe Henry*

Tillmans took his earliest photographs when he was ten, of the moon and the sun as seen through a telescope, of the Andromeda galaxy, of three jets making parallel stripes of exhaust, of lunar eclipses. As a child, he spent clear nights outside and sunny days counting sunspots. Tillmans was born in Remscheid, a manufacturing city near Cologne, where his parents ran a business exporting locally made tools to South America. He was the youngest of three children. There are glimpses of Remscheid in Tillmans's work: a dashboard-camera video of its gray streets, a red-tiled bathroom in the modernist house where he grew up. A 1994 portrait of his mother shows a woman with her hair in a bob, wearing a blue sweater, a string of pearls, and a pageboy collar buttoned up to the top. It's an image of love and propriety.

When I met Tillmans again, in January, it was in London, where he was designing a production of Benjamin Britten's "War Requiem" for the English National Opera. He had spent the morning in a garret office in the opera house with a view of slate roofs and chimneys. He sat with his tall frame tucked into a small velvet chair, wearing a petal-pink Champion hoodie, looking at a foam-board model of a black-box stage with little cutout figures in First World War-era dress. The visuals for the production would be displayed on three onstage screens and included photographs of moss and ruins that Tillmans took at the peace memorial at Coventry Cathedral last year.

Later, over dinner at a vegetarian restaurant in the basement of a wine store in Islington, he recalled his first visit to London, in 1983, when he was fourteen. His host was a woman named Valerie, whom his mother had befriended in 1955 through a postwar exchange program and to whom all three Tillmans children were sent to practice their English. Wolfgang was, he said, "a young extrovert yet introvert discovering gay teen-ager but guessing he is gay and feeling very exploratory in identity questions." He liked Britain for Boy George and Culture Club, for its cooked breakfasts, carpeted bathrooms, drafty windows, spongy bread, Silk Cut cigarettes, and "the repressed but omnipresent sexuality." On subsequent visits, Tillmans would go to his English classes, then change in the bathrooms of Victoria Station, put on lipstick, and join the street scene at Kings Road or Kensington Market. He managed once to go to Heaven, the gay night club, for half an hour, before leaving to catch the last train home, at 11 P.M.

His close friend Alexandra Bircken recalls seeing him for the first time, on a staircase in their high school, in Remscheid, when he was wearing an army parka that had been dyed lilac. "When you meet people at that age, you're sensitive to somebody that answers something that you're looking for in yourself," she said. Bircken, Tillmans, and another young man obsessed with Culture Club, Lutz Huelle, formed an intense friendship.

Tillmans's parents were secular, but, as a teen-ager, he joined the socialist-leaning youth club of the local Lutheran church, with whom he went to the French ecumenical monastery Taizé. Afterward, he listened to the Taizé choral chants as well as to Neil Young, Soft Cell, and Bronski Beat. Every month, he would go to the train station in Cologne to get the new issue of *i-D* magazine, a lifeline to London. Tillmans's descriptions of listening to New Wave music in a small European city bring to mind passages of "My Struggle," by Karl Ove Knausgaard. But Tillmans's friends recall him as almost entirely lacking in neuroses. "Our aim was to go to London and go clubbing and meet outrageous people and break out and wear makeup," Huelle said. "I was much more careful to do certain things, but Wolfgang always had that go-for-it mentality."

At eighteen, during his last year of high school, Tillmans was making a fanzine when he encountered a new photocopier at a copy shop. "It was the first laser printer, really, that was on the open market, and it had the capacity to show photographs photocopied in gray scale," he remembered. "Through the touch of a button, this cheap piece of photocopy paper became a charged object, became something that is of great beauty and meaning to me." He began hanging out at the copy shop, making enlargements from found images. The same year, while on vacation in the French seaside resort town of Lacanau, he took a photo looking down at his own pink T-shirt, Adidas soccer shorts, and sandy knee. It was both a self-portrait and a work of abstraction, and unmistakably a Wolfgang Tillmans picture. He considers it one of his first works of art.

Tillmans bought his first camera, a Contax single-lens reflex, when he was twenty and living in Hamburg. He had opted out of military service as a conscientious objector, and was completing a community-service requirement doing elder care and answering phones for a social-services help line. He had wanted to take photographs for a series of photocopy works, but soon the photographs felt as urgent as the photocopies. He was, he has said, "totally driven without categorizing what I was doing." He invited Bernard Wissing, a co-owner of Café Gnosa, which showed art, to see his work. That led to a small exhibition of some photocopy triptychs. He introduced himself to the London gallerist Maureen Paley, who now represents him, at an art fair in Hamburg, and asked her to look through his portfolio. He took some of his night-life pictures to a party in Copenhagen sponsored by *i-D* magazine, where he persuaded the editors to throw one of their monthly club nights in Hamburg and hire him to photograph it. He tried photography school in Berlin. "Forget everything you know," a lecturer said on the first day. Tillmans, who was by then already taking photographs for the life-style magazine *Tempo*, dropped out after six weeks. He returned to Hamburg on November 8, 1989. The next day, the Berlin Wall fell. He sees missing one of the major socio-political event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decisive—had he been there, perhaps he would have stayed in Germany.

Tillmans seeks out the experience of displacement. In 1990, he enrolled at Bournemouth & Poole College of Art & Design, on the southern coast of England. He described the pedagogic style there as "psychoanalytic." His tutor Tony Maestri was less interested in looking at the students' work than in forcing them to ask themselves why they wanted to take pictures. "To express myself" was not an acceptable answer.

Maestri "was really asking, Why on earth do you think the world needs more pictures?," Tillmans said. "Don't say, 'What is successful and I want to be like that,' because it's very unlikely that you can get to that point from behind. You have to ask yourself, 'What is not there? How do I not feel represented in what is being exhibited?'" Tillmans thought that his contemporaries had not been photographed with the consideration they deserved. When they were shot, he recalled, they were "in odd poses or crazy-looking or with funny effects, almost apologizing for being young or being in a passing phase." He said, "I saw myself as a serious being and not just being one thing, not just being young, but interested in spirituality as much as in hedonism, interested in politics as well as in personal friendships. The multiplicity of myself and my contemporaries—that's what interested me and that's what I wanted to communicate."

In 1992, *i-D* published an eight-page photo spread by Tillmans called "like brother like sister." Its subjects were his high-school friends Huelle and Bircken, who were roommates, but not lovers (Huelle is gay and Bircken is straight). It was nominally a fashion shoot, and the two friends, who had short hair and androgynous bodies, wore a mix of clothes from thrift stores, fashion labels, and their own designs, as well as a T-shirt Tillmans had made that was inspired by a flyer he found in San Francisco that read "FUCK MALE DOMINATION." But it was their existing intimacy, a friendship and comfort undisturbed by the photographer's presence, that had not quite been seen before—the way Bircken holds Huelle's penis as if she were holding his hand, the way he crouches in front of her open legs, looking up as if at something new. "I remember wheeling a suitcase on a golf course and then there was this tree and we thought it was this great idea to climb up it," Bircken recalled of what resulted in an Edenic photograph of her and Huelle sitting in the tree, wearing only raincoats. Maureen Paley took the photograph to the Unfair, in Cologne, where it didn't sell. It is now in the permanent collection of MOMA.

"Lutz & Alex sitting in the trees," first published in i-D magazine, in 1992.

While he was at art school, Tillmans took a photo of a pair of jeans draped over a stair post—one of the first of his "Faltenwurf" series, an ongoing study of drapery. He took his first still-life of fruit on a windowsill. In 1993, at his first gallery shows, at Buchholz & Buchholz, in Cologne, and the Maureen Paley gallery, in London, he hung magazine pages next to printed photographs and inkjet prints, clustering unframed pictures of different sizes. The installations were themselves compositions. In 1995, Tillmans designed and laid out his first book, published by Taschen. By the age of twenty-five, he was, to an unusual degree, fully formed.

He also developed a set of working rules. He does not use a specialized camera, but a Canon S.L.R. manufactured for general use. (Until he switched to a digital format, he always used 35-mm. Fuji film and a 50-mm. lens, roughly the same focal length as the human eye.) He carries a small snapshot camera so that he can be open to "the gift of chance." He never retouches or alters photos. He does not search for examples of particular phenomena in the world; when an idea interests him, he believes, the moment will present itself. He does not photograph people who don't want their photograph taken and will delete a photo if someone indicates a lack of consent. He does not publish photographs of underground spaces or parties until they have closed down. He does not take portraiture commissions from collectors. He does not shoot advertisements.

In February, 1995, Tillmans was in New York, where he briefly considered living (he has photos from this time of rats peeking through storm drains and climbing on garbage bags). One night at a bar, a friend introduced him to Jochen Klein, a painter from Munich. The two artists fell in love. Tillmans and Klein were together for a little less than three years, which, as Tillmans said in a 2015 interview, "always sounds so brief, but it was the perfect match." The most famous photograph Tillmans took of Klein is "Deer Hirsch," in which Klein stands facing an antlered deer on the beach, his hands spread. There are others, too: of Klein taking a bath; watching the moon rise in Puerto Rico; playing near a waterfall. Tillmans introduced Klein to the music of New Order and Richie Hawtin; Klein introduced Tillmans to the writing of Jacques Lacan and Leo Bersani. When Tillmans returned to London in March of 1995, they exchanged daily faxes and, later, visited each other. Klein moved to London in the fall of 1996, a period Tillmans has said "was fuelled by a profound sense of happiness." That year, he had his first solo museum show, at the Kunstmuseum Wolfsburg. In the spring of 1997, the Hale-Bopp comet glowed in the sky, and Tillmans began taking a series of photos of Concorde airplanes in flight over London. He wanted to capture this last symbol of the space age, when people believed they could conquer time and space through technology.

Later that summer, after the opening of Tillmans's exhibition "I Didn't Inhale," at the Chisenhale Gallery, in London, Klein came down with AIDS-related pneumonia. Neither he nor Tillmans had known that they were H.I.V.-positive before Jochen's illness, which lasted only a month before his death. There are a few photographs from the period: "Forever Fortresses," of Tillmans holding Klein's hand across a hospital bed; "o.M.," a self-portrait Tillmans took in Klein's studio, having cleaned it out after Klein died. The grief, Tillmans said, lasted three years.

There is an impulse, when confronted with a new photograph, to insure that it remains unblemished. But overprotectiveness, whether in the form of a frame or a low-light environment, can also inhibit its power. Tillmans usually shows the image on the wall, unframed, "in its own body, in its pure existence." He relates his way of displaying his work to what he calls his message of "the non-scariness and non-harmfulness of responsible impurity." As he put it to me, "The coexistence of spirituality, an interest in Krishnamurti, in Quakers, and in twenty hours spent at Berghain—you know, that's not mutually exclusive."

Tillmans hangs chromogenic prints with Scotch Magic tape, inkjet prints using binder clips hung on nails, and magazine pages using stainless-steel pins. He specifies lengths of tape to the millimetre, the exact number of binder clips for each print, the angles at which nails are to be hammered into the wall, the kind of nail to use. Tape doesn't touch a photo's emulsion, only other pieces of tape stuck to the back. He uses tape dispensers of a specific make (Tesa), which don't cut with serrated edges, and he signs his work with Cretacolor 7B pencils. Unusually, the gallery lights are installed before he hangs the work. He has standard heights at which the largest photographs are hung from the floor. Such instructions, along with many others, are compiled in a binder for each exhibition that contains international voltage and plug charts, instruction manuals for audiovisual equipment, detailed lists and photographs of the contents of each shipping crate, and illustrated diagrams for how to unpack a photograph from a shipping tube.

In April, I travelled to Kenya, to see Tillmans install a show. I had watched him and Federico Martelli, a Chilean exhibition adviser who lives in Rotterdam and works part-time with Tillmans and part-time with Koolhaas, map out the exhibition a few weeks earlier, in Berlin, when a grainy snow was falling outside. They ate McVitie's digestive biscuits and Tillmans smoked Gauloises as they directed the placement of images on an at-scale software rendition of a gallery space on another continent. When I arrived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GoDown Arts Centre, in Nairobi, I understood how meticulous the planning had been. The plaster walls at the GoDown were uneven, and the climate control consisted of some open-air vents, but the walls had been freshly painted. Tillmans had already hung some of the largest photographs as planned. The rest of the installation was guided by intuition. Tillmans cued up Neil Young's "Like a Hurricane" ("my favorite song of all time") on his iPhone SE, which he placed on the floor in the center of the room. Then he glided around, pieces of Scotch Tape stuck to his work pants and his purple T-shirt, holding photos between finger and thumb, two hands on opposite corners. "The material commands it," he said of the method. Pick a photograph up with three fingers and it kinks: "Fear is the thing that destroys the pictures."

The installation passed, unhurried, over three days, each with a sit-down lunch. At the GoDown, Tillmans hung the portrait of Frank Ocean. He hung a picture of a toucan. "The toucan is obviously not an African bird," he said. He placed the toucan where a picture of Lady Gaga had been, then removed it. He hung a snapshot-size photo of bonobos on one wall, then a photo of a grid of light bulbs at a light-bulb store on another. When showing his work in conservative countries, Tillmans sometimes takes out the more sexually explicit content, but, he said, "I make sure a tender gaze toward the male body doesn't go unnoticed by a straight male audience. That is my minimum." He climbed a ladder and hung several photographs—from a series on apple blossoms—around the top of a door frame. He asked an assistant, a Colombian visual artist named Juan Pablo Echeverri, what he thought. Echeverri made a slightly displeased face.

"It's a bit wannabe, no?" Tillmans said.

"Yes," Echeverri said.

"Chopped. Heads must roll."

"Apples must roll."

One night, a Friday, Tillmans said, almost as an aside, that, rather than go out, as planned, he would stay at the gallery to do his "little wiggle." The team took the cue to depart, and left him there on his own, with three pre-opened Tusker beers placed on his worktable. The next morning, a wall of photographs from his "Fruit Logistics" series had been installed.

Martelli has worked with Tillmans on travelling exhibitions since 2006 and Echeverri since 2012. They had come to Nairobi a few days ahead, to prepare for the installation. Later, at a talk Tillmans gave at the Goethe Institute in Nairobi, an art consultant who works with the GoDown Arts Centre gave a sense of what the arrangement might be like on the receiving end. "There's a group of people who arrived before you—I'd really like to understand what is that relationship," the consultant, whose name was Muthoni Mbondo, said in a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They're kind of very obsessive about your work and how it's shown and how it's kept and all of that. I was kind of resistant to even seeing your exhibition, because I thought, Who is this?" Tillmans took the comment without offense: "We know many things by experience go wrong, that are not done the way we ask them to be done. People just expect this to be ultimately just a normal hang, just a normal installation, you know? But we work in a particular way, and we need to work late, and it's really fragile stuff, like we need the floor clean because we lay out stuff on the floor, and we need the walls to be evenly lit because every lighting person in every museum in the world goes by the logic 'I only start working once the pictures are on the wall.' And I'm the other way around—I need evenly lit walls to start placing the works. And so, from experience, I know institutional resistance to new ideas or to change, and it does, unfortunately, come across as control-freakery."

On bigger exhibitions, like this one, Tillmans also brings Anders Clausen, a Berlin-based sculptor from Denmark, who helps with the installation. Clausen is Tillmans's best friend, ex-boyfriend, and something like a platonic life partner. They met in Berlin, in 2004, at a gay anarchist-café night held in a squat. "The night was called Rattenbar: Rat Bar. And there he was," Tillmans has said. "We caught our eyes and stayed together for eight years." Clausen is almost ten years younger, and has a sly irreverence that balances Tillmans's seriousness. "Anders and I are no longer boyfriends, but we have a deep bond. On the other hand, we don't have the ties that weigh down," Tillmans said of their relationship now. "He certainly is like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in the last fourteen years."

In this group dynamic, Martelli and Echeverri bring the jokes and extroversion, Clausen the security and intimacy (and some task-mastery: "You have five minutes to finalize this show," he told Tillmans at the end of the last day). Martelli and Echeverri have absorbed Tillmans's meticulous standards for hanging pictures, but they also glean night-life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locals and pass them on to Tillmans, explain to him the appeal of Selena Gomez, and generally make everything more fun. Having worked with them for years, Tillmans relaxes in their presence. When they were having a drink after a day of work, or a break for lunch, he would sit quietly while they chatted, until Clausen beckoned him to sit closer and put an arm around him.

On Monday, after the installation was finished, Tillmans and Clausen took a day for sightseeing. I met them before dawn at their hotel, where a driver arrived to take us around Nairobi National Park,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next to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Tillmans had been reluctant to go. "It seems I often do not want to do what everybody else does," he said. But he has learned that famous attractions are often famous because they are special. His Nairobi show included a two-metre-high print of a photo he took in South America of Iguazú Falls, in 2010.

In the park, Tillmans recorded birdsong. He photographed a rhinoceros ("It really does look like the Albrecht Dürer drawing!") and a mother lion ("Oh, the children!" he said when he noticed her four cubs, to Clausen's great amusement). The city of Nairobi is encroaching on the wildlife reserve—one day it may swallow it—and the Kenya Railways Corporation is building a railroad to the city of Naivasha through the park's boundaries. Tillmans asked the driver to take us to the construction site where the China Road and Bridge Corporation, China's state-owned construction firm, which is doing the work, had begun erecting risers for the elevated tracks. Photographs were forbidden, but Tillmans surreptitiously took a few as we drove, and again as the driver did a U-turn and drove back.

That tended to be how it was, when I saw Tillmans take photographs: casual and barely noticeable, often in motion. In Berlin, he took photographs of a building under renovation across the street from his studio, and of his friends dancing at Clausen's fortieth birthday party. In Kenya, I saw Tillmans reach around a driver's head to take a photograph through the driver's-side window of people assembling wheelbarrows. After a radio interview at Keny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he took a portrait of the host, Khainga O'Okwemba. As we were walking out of the building, he photographed a pink wastebasket in the corner of someone's office, a spider plant placed underneath the stairs, and a sign declaring the corporation "a corruption-free zone." In New York, three months later, walking north from the Whitney Museum to the David Zwirner gallery, in Chelsea, where Tillmans has a show this fall, he led me along the West Side Highway. As we walked past construction sites, open-bed trucks loaded with building material, and construction workers sawing amid showers of sparks, he took photographs. I saw the things that I have mentioned, but what he might have been seeing in that moment would not be revealed until it became a photograph, if it became one at all. "People are so unable to talk about what makes a picture, because technically they're all the same, they're all pigment on paper, and we are using the same cameras," Tillmans told me. "The reason why a photograph I take can be recognized is literally beyond words."

8 AM IN THE SLEEPER ELEVATOR CAR

Tillmans, who considers his anti-nationalism posters to be a discrete project, has never put daily politics at the center of his visual art. But after 9/11, as he was emerging from a concentrated phase of formalist experimentation, he began to confront the rise of absolutism more directly. "I felt, by 2003, that there was an alignment around the world, from radical Islamists to fundamentalist Christians to people who wanted to dismantle public services to neoliberalism, that wanted to undermine, roll back,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ublic space," he said. The lie that there were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the subsequent invasion of Iraq, claims by Thabo Mbeki, then the South African President, that AIDS was not caused by H.I.V., and by his minister of health that it could be cured with garlic and lemon juice—these kinds of untruth put Tillmans in a state of distraction. He responded with arrangements in his exhibitions of what he called "truth-study tables"—collections of articles and images that documented his process of "observing how I observe."

On a Monday in mid-July, I met Tillmans to see a retrospective of the artist David Wojnarowicz at the Whitney. Tillmans was wearing camouflage shorts, teal-and-white Nikes, and the "FUCK MALE DOMINATION" T-shirt he photographed in "like brother like sister," twenty-six years earlier. Wojnarowicz died, of AIDS-related causes, in 1992, just as Tillmans's career was beginning. Tillmans felt a particular connection to Wojnarowicz, his lover and mentor Peter Hujar, and their friend the artist Paul Thek. He recalled going to see a Thek show in 1995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in Berlin with Klein. In the years after the start of the Iraq War, he said, "I had the sense that, I'm here, I'm successful, I have a language, I've survived, it's my time to speak more clearly." In 2006, he began a nonprofit gallery, Between Bridges, that presented political work by artists who did not have a voice, either because they were dead or because their work had little potential for profit. The first show was of Wojnarowicz, whose work had not been seen in the U.K. before. Earlier this year, Tillmans turned Between Bridges into a foundation, with the aim of supporting the arts and democracy, and with a focus on L.G.B.T.I.Q. rights and combatting racism.

We walked through the exhibition in what turned out to be the wrong direction, counterclockwise, so that it began with Wojnarowicz's illness and activism, and ended with his more playful work from the early nineteen-eighties. (Later, buying copies of the catalogue, Tillmans gently suggested to the Whitney staff that the intention of the design should have been made a bit clearer.) It pained Tillmans that Wojnarowicz's activism or illness might overshadow his art. "He didn't do this because he wanted to be particularly activist," Tillmans said. We had paused in a room of paintings of flowers made in the final years of Wojnarowicz's life. "He was interested in art, he was interested in beauty, he was interested in love, and people, and life."

With his phone, he took a photograph of a block of wall text and e-mailed it to me. It included a quote from the artist Zoe Leonard, who recalled showing her work to Wojnarowicz and apologizing to him for how apolitical it was. "We're fighting so that we can have things like this, so that we can have beauty again," she remembered his saying.

Tillmans's show at the David Zwirner gallery is called "How likely is it that only I am right in this matter?" In late August, I wrote him to ask if he would be showing any photographs from Nairobi. He replied that there was a street scene, and a still-life taken at a sexual-health clinic at the Kakuma refugee camp, in northern Kenya, which he had visited on the same trip (he is a longtime don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I also asked if there would be any photographs of Clausen's birthday party.

The gathering had doubled as an eviction party—Tillmans and Clausen had maintained an extra studio space in Kreuzberg, and lost it to gentrification. In mid-March, the two artists had turned the cleared-out space into a mini night club, complete with a Funktion-One sound system, a bouncer with the word "faggot" tattooed under one sideburn, and refrigerators stocked with Radeberger beer and sparkling Riesling. There had been a chill-out space, a cake decorated with marzipan and Turkish delight, and light projectors that Tillmans had last used for an installation in the Tanks at Tate Modern. Tillmans had supervised the hot-gluing of several crates of daffodils to the windows and walls. To the party, he wore a maroon T-shirt from Xi'an Famous Foods, the New York restaurant, with gray-and-pink Nike high-tops. Clausen wore a navy-blue T-shirt from NASA's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and had put on a pair of hoop earrings. When I left, around when the last d.j. started, at 5 A.M., Tillmans was happily lying across a pile of his friends on a couch.

"There is no picture from the moving out / Anders 40 party in the Zwirner show," he wrote. "The whole exhibition has no pictures that read overtly in a personal life way." He attached a photograph of the studio space taken just before he handed over the keys. After other parties, Tillmans has photographed empty rooms littered with bottles, Christmas lights, and gold mylar in daylight. This photograph showed a clean room, the white walls still dotted with glue, a bar of sunlight across a doorway, and a mop handle against the wall. ♦

相关阅读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卓纳艺术家简介
回顾提尔曼斯重要美术馆个展
《纽约时报》｜访提尔曼斯工作室
《Ocula 意见》｜沃尔夫冈·提尔曼斯式共振：凡触碰的，都有了关联

收藏垂询
长按二维码

微信编辑：Chantal

David Zwirner
卓纳画廊
纽约｜洛杉矶｜伦敦｜香港｜巴黎

卓纳画廊，自1993年在纽约创立至今，举办了大量创新、前瞻的展览，活跃于一级、二级艺术市场。画廊致力于培育艺术家的职业发展，目前代理了近八十位在世艺术家和已故艺术家遗产。

众多卓纳艺术家已是艺术史上巨擘，或享誉世界。其作品频繁亮相于国际著名美术馆和双年展，亦是知名美术馆和私人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davidzwirner
@davidzwirner
@davidzwirner
davidzwirner.com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 Wolfgang Tillmans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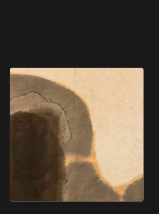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 Wolfgang Tillmans · 目录

上一篇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正在消失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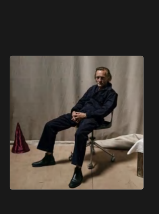
下一篇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的生活与艺术｜长篇人物特写（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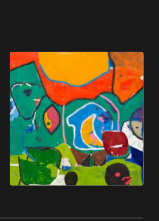
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今日生日｜尹亨根（Yun Hyong-keun）
卓纳画廊DavidZwirner



今日生日｜米凯尔·博伊曼斯（Michaël Borremans）
卓纳画廊DavidZwirner



超越传统的抽象主义，一键走进乔·布莱德利（Joe Bradley）的绘画
卓纳画廊DavidZwirner